

近代史研究

4

1989

JINDAISHIYANJIU

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之中国

赵 复 三

在北京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我们不能不思索的是：法国大革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以及它所树立的价值在今天的意义。现代中国从20世纪初算起，长期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经过10年，推翻了已经腐朽的封建统治，建立起共和国。这次革命并未真正改变中国人民大众的悲惨处境。在共和国成立10年后，中国工人阶级再次举起革命的大旗，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进行将近30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经历了30年曲折发展，自1979年起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不平凡的近90年里，几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都可以察觉到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这里拟分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化，孙中山领导创立共和国前后的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领导创立中国工人政党前后的时期，和近10年这四个时期，就法国大革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作一点初步的探索。

—

20世纪的第一年是以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清王朝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载入中国历史的。它使中国面临灭亡的危险，激发中国

社会各阶层奋起图存和革命思想的迅速发展^①。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资产阶级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为主角的时期。

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中，有主张在君主立宪制下进行改良的，有主张实行政治革命的，有由主张改良转向革命的。无论哪一派，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对法国大革命划时代意义的认识，对大革命所代表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分析以及中国从中得到的启示。

当时改良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梁启超曾著《罗兰夫人传》，描述罗兰夫人由最初支持路易十六转而投身于革命，最后，不死于王党、贵族党，而死于平民党，不死于革命失败之时，而死于革命告成之后。这法国大革命中悲壮的一页，使梁启超受到极大的震撼，“觉有千百万不可思议之感想”，使他“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惧，忽焉而哀”，认为大革命是“最惨最剧之场”。虽然如此，梁启超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地位仍然充分看到：“夫法国大革命，实近世欧洲第一大事也。岂惟近世，盖往古来今，未尝有焉矣。岂惟欧洲，盖天下万国未尝有焉矣。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其余波亘八十余年，其影响及数十国土，使千百年后之史家，永以为人类新纪元之一纪念物。噫，何其伟也！”^② 这比他的老师康有为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洪水猛兽自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当时另一位政论家汉驹更热情地称颂：“经法兰西三次革命之震荡之洗刷，风潮所遍，轰动全欧，自由钟振而专制之妖氛灭绝，平等旗张而阶级之毒焰扫清，所谓平民政治者，乃大出现于十九世纪。”^③ 由法国大革命掀起的时代洪流，并不仅限在欧洲大陆。1903年，柳

① 参阅梁启超：《灭国新法论》，载《饮冰室文集》，广智书局光绪31年版，上卷，《通论》，第230—242页。

② 见《饮冰室文集》下卷，《传记》，第190—200页。

③ 汉驹：《新政府之建设》，载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1978年版，第1卷，下册，第584页。

亚子写道：“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于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苗，自由平等之名词，始映于我邦人的脑膜。”^①

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法国大革命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是不可分的。梁启超是一个代表，他不仅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而且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孟德斯鸠学说也分别作专门的探讨，写出《卢梭学案》（1901）和《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1902）。对于卢梭，梁启超不仅扼要全面介绍他的思想，还称颂他“以只手为政治学界开一新天地”，“为世界众生开无前之利益”；对卢梭推崇的瑞士联邦制，他也期望有朝一日推行于中国，甚至全球。但是，他对卢梭并没有一味歌颂，指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其初以人人意识之自由为主，及其论民约之条项，反注意邦国而不复顾各人”^②。的确，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调节适度，不仅是卢梭的困惑，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殚精竭思、力求解决的大问题。梁启超既肯定卢梭是民主主义开山之祖，又指出卢梭学说中的矛盾，以“人民为国家之附庸”，是卢梭学说中的“瑕疵”，这是很有见地的。对于孟德斯鸠的政体论，梁启超认为他对民主政治认识还不够透彻；认为孟德斯鸠重视君主、贵族，“不知平等之义”，“而未达法治之大原”，因为法治的根本原理就是“一国之中人人平等”。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则是“孟氏创见千古不朽”。梁启超比较卢梭与孟德斯鸠，认为“卢氏之说，以锐利胜”，“孟氏之说，以致密胜”，两人各有所长，而孟德斯鸠的影响更为显著^③。

当时中国思想界对卢梭、孟德斯鸠的强烈兴趣，并不仅限于政治思想。如1902年杨度就把卢梭的政治思想和他的教育思想联

① 柳亚子：《中国立宪问题》，《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594页。

② 梁启超：《卢梭学案》，载《饮冰室文集》下卷，《学说》，第7—18页。

③ 梁启超：《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载《饮冰室文集》下卷，《学说》，第31—39页。

系起来，称：“路索（卢梭）之为学也，以任放主义而为国民开自由之路，为全欧成革命之功。其言教育也亦然。以为人性皆善，其恶者必由丑恶之社会而来，教育者所以防社会之丑恶，而发育其善性，使之任放于自然也。”^①杨度自然是深知卢梭在《爱弥尔》一书中所阐述的教育思想，才能这样简括地表达出来。从卢梭、孟德斯鸠，又引起人们对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哲学的兴趣。1903年《大陆》杂志上介绍《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狄德洛）、拉梅特里之学说》，称：“法兰西人民之革命也，……《万法精理》（按：即孟德斯鸠《法的精神》）及《民约论》（按：即卢梭《社会契约论》）固不朽之伟业乎，百科全书亦绝大一纪念碑也”。“底得娄以哲学之深思，运之以热心，论述自由而无所惮缩”。“然底氏之说，仅发唯物论之端”，“其大倡兹论，扫一世之陋说习见，独立无惧，自标新义者，实拉梅特里也。”^②作者把唯物论看作真理论，认为共和革命的思想基础是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哲学。这可以反映当时中国思想界对法国大革命认识的深度，尽管其中还有不少片面、带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地方。

法国大革命给清末的中国什么启示呢？梁启超在《过渡时代论》中指出：西方各国经历18、19两个世纪“以过渡于新世界”，“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对于过渡的含义究竟是革命还是改良，他含糊糊讲不清楚，但是，他歌颂过渡时代是“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同时，又承认过渡时期充满险阻曲折，“或渡一次而达焉，或渡两、三关而犹未止焉。……或发端遇挫折，卷土重来而卒渡焉。”各国经验不同，有的顺流而渡，有的借风附帆而

① 杨度：《〈游学译编〉叙》，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50页。

② 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11—412页。

渡，有的方舟联队而渡，独法国大革命是“乱流而渡”^①，不仅经历1789到1793年的革命，尔后又又有1830年、1848年的革命，君民两党转战接斗殆数十年，“而法国民主之局亦从兹大定矣”^②。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法国大革命中找到未来中国的理想和革命纲领。1903年，邹容在上海发表《革命军》，服膺卢梭、孟德斯鸠的思想，自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热情鼓吹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主张经过革命，建立中华共和国，保障天赋人权，实现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认为“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革命有野蛮、文明之分，野蛮的革命有破坏无建设，文明的革命则是为建设而破坏；革命又必须依靠人民大众，而不是只靠少数英雄。因此，邹容提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这种教育的内容要使“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③。清政府逮捕邹容与支持他的章太炎，反而使革命派的声势大振，邹容的文章更为人传诵。

法国大革命鼓舞了当时的革命派，而革命派的思想却并不曾停留于法国大革命的水平。不久以后，又有人认为根据中国社会情况，“当取欧洲尚未经历之经济革命，以为政治革命之引药线”，“下等社会之困难于经济，类皆受上中二等社会之压制，故共产均贫富之说，乃个人所欢欣崇拜，香花祝而神明奉者也”。作者主张：“以此铸我国民之魂”，“而后可以革命”^④。梁启超也曾在1902年写过题为《中国之社会主义》的短文，提到麦喀士（马克思）、拉士梭尔（拉萨尔），既称社会主义是近百年来世界之产物，又称中国古已有之^⑤。1903年，浙江留日学生在《浙

① 见《饮冰室文集》上卷，《通论》，第226—230页。

②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同上书，《通论》，第219页。

③ 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49—677页。

④ 壮游：《国民新灵魂》，见同上书，第571—576页。

⑤ 见《饮冰室文集》下卷，《谈丛》，第98页。

江潮》上还有题为《新社会之理论》的文章，介绍共产主义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但这终究只是新学说的片断介绍，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

20世纪初的中国，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为号召的革命思潮迅速发展，为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由法国大革命送到全欧、又跨入亚洲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与纲领，受到中国思想界的热烈欢迎，对革命思潮的发展仿佛是春雷催万绿。虽然时隔近90年，我们还能隐约想见当年的盛景。

二

孙中山走上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1894年，他向李鸿章上书，内容只是希望清政府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章程第一条说：“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①并没有提出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战败，中国被迫向日本割让台湾，缴付巨额赔款，引起国内各阶层人民普遍不满，小规模武装起义不断。这个形势推动兴中会也进行多次不成功的武装起义，但直到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对于革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其政纲始终是模糊的。孙中山回顾过去的活动时，也只是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②。1905年秋，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拟定会员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对革命的目标，只提出一个轮廓。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才提出：“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③而对这“三大主义”

① 《兴中会章程》，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5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72页。

③ 《孙中山选集》第75页。

都没有详细发挥。一年以后，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说中，孙中山对“三大主义”才作了比过去略多的阐述。对民族主义，他认为不必要多少研究。谈到民权主义时，他说：法国大革命“没有种族问题，却纯是政治问题。法兰西民主政治（体）已经成立，……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这也是人人晓得的”。就是说，中国革命后的政体便以法国大革命后的民主政体为蓝图。关于中华民国的宪法，孙中山认为，孟德斯鸠以英国制度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立三权分立的学说，后成为美国宪法的基础。中国将来应实行“五权分立”，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再加独立的考选、监察两权，也是以法兰西共和国为蓝本的^①。孙中山是个意志坚强、正直无私、献身革命与建设的理想家，因此享有巨大的威望，但在革命运动中，各种野心分子、腐化官僚都在所难免地混入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因此，1924年，孙中山痛苦但又勇敢地承认：“中华民国成立至今，虽然有了十三年，全国还是四分五裂、大乱不已”^②，“这十三年来，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③。但他坚信：“只要革命发生以后，纵然一时不能成功，或者失败几十次、几十年——法国有八十年，美国有八年，俄国有六年——，革命到最后总是成功。”^④法国大革命的曲折历史使孙中山坚定了信念并用来鼓舞追随他的革命者。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党人帮助下，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这在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一生中，不仅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使他在政治思想上有了新的开展。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系统阐述。这里，令人感兴趣的是他把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与三民

① 《孙中山选集》第80—89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571页。

③ 《孙中山选集》第579页。

④ 《孙中山选集》第571页。

主义联系对比所作的评论。他说：“从前法国革命的口号是用自由、平等、博爱。我们革命的口号是用民族、民权、民生。究竟我们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号有什么关系呢？”孙中山所给的解释是：“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这样就把三民主义与人们耳熟能详的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巧妙地结合起来了。

孙中山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取得廉价的支持所做的语言游戏，而是有他剖析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深意的。

他说：“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是很有深意的”。“欧洲人民因为从前受专制的痛苦太深，所以一经提倡自由，便万众一心去赞成”。“到了目的已达，各人都扩充自己的自由。于是，由于自由太过便发生许多流弊。所以英国弥勒氏便说，一个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自由，……立了自由的范围，有了范围，便减少很多自由了。由此可知，彼中学者已渐知自由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之物，所以也要定一个范围来限制它了”。而中国的国情呢？“自中国革命以后，列强见到用政治力瓜分中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现在他们稍缓其政治力来征服我们，便改用经济力来压迫我们”，“政治力的压迫是容易看得见的”，“经济力的压迫，普通人都不容易生感觉”。中国所需要的，首先是争民族的自由。孙中山驳斥西方学者观察中国，每每说中国大众文明程度太低，政治思想太薄弱，不懂得为自己争自由。他认为中国首先要争取国家民族的自由，为此就要把大众集合成一个坚固的团体。“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

说到民权与平等自由的关系，孙中山认为：“有了民权，平等自由才能够存在，如果没有民权，平等自由不过是一种空名词。”“平等自由，实在是包括于民权之内”，“民权发达了，便有真正的平等”。同时，他又认为，发展民权也不能走到极端，像法国大革命以后，把民权推到极端，“弄到无政府。……就是真革命党，也有时因为一言不慎，和大众的意见不对，便要受死刑”。这样就反而成为实行民权的障碍。孙中山研究西方国家争民权的历史和胜利之后所得的结果，感到“民权政治在外国也不能够充分实行”，“民权问题在外国政治上至今没有根本办法，至今还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外国的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孙中山虽不赞成完全仿效欧美，却认为要借鉴欧美的经验和学理，把它们研究清楚。他看到西方民权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民权发达以后，人民便把政府看作是对立的另一方，无论如何都不满意，结果民主国家办事很慢，反不如集权国家进步迅速；认为这个问题在西方还未找到解决的办法，中国应去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①。

把20世纪20年代中叶孙中山晚年的思想与20世纪初一些政论家的思想相比较，同样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但是孙中山的思想显然向前迈进一大步，这和他在国外长期观察了解西方的情况，既不盲目崇拜西方，又不盲目排外，当然是分不开的。

三

和孙中山相衔接的是在民国成立之后登上中国政治思想舞台的一代。由于资料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举陈独秀、李大钊两人，看一下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法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相互激荡，在中国思想界所引起的反应。

^① 引文见《三民主义》，载《孙中山选集》，第615—301页。

早在1915年，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的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认为近代西方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有三种理论：人权理论、生物进化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它们都是来自法国。法国大革命把人权思想传播到欧洲各国。“欧罗巴的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自此，树立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使本来受辖制于特权阶层的大多数人民得到政治自由的权利。其次，1809年，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的《动物哲学》一书问世，提出生物最古的祖先是最低级的有机体，而有机体又是由无机物自然发生，经过遗传和环境的作用而逐渐进化。在拉马克之后50年，达尔文通过实地考察研究，发表《物种起源论》，证明生物进化、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原理。从此以后，人认识到“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夙，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使人类在智识领域得到一大解放，追本溯源，达尔文的理论是以拉马克的理论为基础的。其三，陈独秀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政治上法律上人人有平等权利，而由于私有财产制，昔日“君主贵族的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法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但政治革命若没有社会革命，仍然是不彻底的，还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消除私有制造成的社会压迫。这种社会主义的思想，源自法国大革命时巴贝夫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共有制。19世纪，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又认为私有制违背人权原则，主张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公民按劳获酬，以这样的理想来建设新社会。这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来源。马克思师承法国社会主义思想，把它发扬光大。随着欧美劳资矛盾的尖锐化，社会革命的呼声也愈高，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要采取社会政策，限制兼并，避免贫富过分悬殊。追本溯源，也是来自法国的思潮影响^①。

^①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载《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3页。

就理论认识说，陈独秀显然又超越于梁启超和20世纪初期的思想家们之上。他既看到民主革命的意义，又认识到它的不足，有待于社会革命，当时人所说的“社会革命”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但很模糊）。在这一点上，陈独秀与孙中山是一致的，而陈独秀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便看到这一点，在思想认识上比孙中山先行了一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极大地教育了中国思想界，并不是“公理战胜强权”，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又回到了老样子，在国际上则是大国对殖民地进行再分割。这使陈独秀对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的信仰大大动摇，而转向俄国革命。1919年4月，他评论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它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它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①此后，陈独秀的思想才明显地转向马克思主义。1920年，陈独秀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西方民主主义，认为西方民主主义“在从前政治革命时代，它打倒封建主义的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的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地反对它。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两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的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哪里去找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识，……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所以不行，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②陈独秀在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两种思想激荡中，所思索的中心问题是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旧的民主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是有它的功劳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旧的民主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维护它的统治、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这便是他

① 《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载《独秀文存》第499页。

② 《民主党与共产党》，《独秀文存》第603页。

得出的结论。

和陈独秀比较，李大钊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反应要敏锐得多。1918年夏，在陈独秀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之前将近一年，李大钊便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称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同是影响未来世界文明的绝大变动。法国大革命的景象，曾在当时欧洲引起人们的惊骇，对革命深抱悲观，然而法国大革命不仅为法国人民带来自由幸福，也为19世纪西方政治奠定基础。现在，俄国革命也将成为20世纪以后文明的萌芽。他又进一步分析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指出法国革命是政治革命而兼含社会革命的意味，它是立于国家观念之上的；俄国革命则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并且着眼于世界的未来。时代不同，革命的性质也不同。李大钊并且把它与俄罗斯文化传统联系起来，预言从俄国革命中将产生世界的新文明^①。革命必然会引起一时的乱象，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都不例外，但李大钊从法国大革命和其后相隔128年的俄国革命中都看到它们开辟了世界新纪元，而以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与历史业绩来支持人们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表现了卓越的历史远见。

在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激荡下，陈独秀是在理论上寻求解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李大钊则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致力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结与转变。1921年到1924年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为各革命阶级联盟期间，李大钊写了《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实际工作中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他写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等论文，指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即现称民主主义）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

^① 《法俄革命之比较》，载《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104页。

治”^①，中国人民应联合成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外国的侵略，打破国内的阶级压迫^②。李大钊称颂孙中山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汇合起来，加以改造，经俄国十月革命推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使少数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接起来，这是孙中山的伟大功绩。他虽已去世，他的主义仍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继续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联合推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当时还没有用新民主主义的概念）是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革命的继续与发展。

从梁启超到李大钊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孕育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毛泽东晚年追忆说：当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被解散，毛泽东回去念书，读了大量严复译述的西方政治学术名著，其中就有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1918年8月，毛泽东到北京，此后，陈独秀、胡适代替梁启超、康有为，成为他的“楷模”^③。实际上，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直到“五四”运动兴起之后，毛泽东思想中对革命与改良还并未能作出革命的选择。1919年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还反对用强权打倒强权，主张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避免“炸弹革命”、“有血革命”^④。对于法国大革命，他的理解是“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在比较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时，他认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更广、更深远”^⑤。这反映出，

①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李大钊选集》第397页。

② 《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李大钊选集》第401页。

③ 肖延中：《论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④ 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

⑤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2—4期。

直到“五四”运动兴起之际，毛泽东受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影响还是相当深的。

回顾20世纪的前半叶里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三点：

第一，20世纪的中国在寻找出路时，从法国大革命看到中国的前途就在于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由此开始了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革命成为它的主题。

第二，在前1/4世纪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人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但从实践中认识政治革命并未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从理论上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限制性；于是又从俄国十月革命找到新的理论与实际的支持，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这成为20世纪第二个1/4时期中国历史的主题。

第三，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不仅有它的政治发展的逻辑，也有思想发展的逻辑。这个逻辑既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又预示了新的人民共和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时还不得不继续完成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求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四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前夕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革命胜利的30年间，始终贯串着一场究竟要革命，还是要改良的争论，直到最后，历史自身为这场争论作了结论，革命胜利了，不仅是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接着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胜利。这时，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究竟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同时在政治、社会领域进行逐步改革；抑或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继续革命，方能推动生产，引起一场争论，一直延续发展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1979年以后，中国才真正进入发展生产，改革经济、政治、社会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迄今又10年了。

回顾人民共和国的40年，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如果从政治思想角度加以考察，将会发现至少有以下四个重大问题，是40年来中国思想界在不断探索，并能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原则中启发思索的：

(1) 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前面说到，从20世纪开始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半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革，伴随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了一场历时50年之久的激烈论战，究竟要革命还是要改良。坚持革命、反对改良的思想，孕育了两三代中国人。当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现实要求集中精力从事经济社会建设时，人们对怎样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缺乏经验，在经济社会建设中，思想还不免受到过去半个世纪的影响，反映出对已进入的历史新时期缺乏思想准备（也就是理论上的认识）。革命与改革在一定条件下是对立的，当条件改变时，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革命打破旧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扫清道路，法国大革命后200年来西方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40年，总的说来，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革命胜利之后，采取改革来推进经济社会变革，不用暴烈手段，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究竟怎样进行改革？这个问题在我们是经过1949年到1978年30年的探索，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最后解决的。而在全面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组织的大变革，及伴随而来的社会生活方式、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其广度、深度、长期性和复杂性，所要求于改革者的创新精神、牺牲精神、坚韧不拔精神又无异于一场大革命，只是不采取暴烈的方式，难度也更大。因此，邓小平称中国的全面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对于这后一点，有不少人似乎又一次缺乏思想准备。在这里，法国大革命的曲折进程，对今日中国仍然是富有教益的一课。

(2) 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古老的问

题。中国文化传统中把个人完成社会责任作为个人道德的自我完成，它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凝聚力量，同时又往往压制了人们个性的发展。这既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优点，又是它的弱点。这个社会思想土壤比较容易接受革命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集体主义，同时又容易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中本来具有的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一致的思想，曲解成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压制个性、剥夺个人权利、忽视个人利益。

在思想领域它表现为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意味深长的是，从50年代反对思想言论自由的政治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中反对“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仿佛都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幽灵作战，它们的是非曲直，历史已经做了初步结论，这里不需要多谈。可悲的是，正如罗兰夫人临死之前所说：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我们建国后30年间所经历的政治思想运动、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下，把中国文化传统中腐朽的思想专制、不尊重个人披上无产阶级的外衣。当这些运动的是非曲直得到澄清以后，在有些人眼里，社会主义理想的光辉被蒙上阴影，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也被有些人认为不值一顾。在这种历史的强烈反动下，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利益之间，有些人强调个性，追求个人利益，发展到忽略社会公共利益的程度。它以一种相反的形式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加以商品经济为它提供了辩解，被曲解了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为它提供了助力，这就使我国当前这个问题显得比西方更为突出。在社会生活中，既有压制个人自由的封建思想，又有片面强调个人自由的个人至上思想，由此引起的反应，无论强调个人自由或强调社会利益，都往往容易陷于片面；由此出发去比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难以做到全面的理解与把握。

为了恢复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本来具有的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的思想，西方在两个世纪社会实践中提出的